

让想生的敢生,“二孩”才能落地

国家两年之内两次放开政策,足见调整人口结构的重要性,那么,如何让政策放开收到实效,就不仅仅是家庭的选择了。相比于单纯的政策放开,更需要一系列的保障举措,减轻家庭为养育子女所承受的负担。

QILU EVENING NEWS
www.qi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2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ilwb



齐鲁晚报微信
qilwanbao002



读者服务中心
www.q96706.com



评论员观察

上周末,“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随即有不少媒体进行了落地调查。在接受采访的适龄人群中,尤其是那些已经育有一个孩子的人,有相当一部分表示“想生却不敢生”——考虑到养育孩子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有生育的意愿,却不太可能变成实际行动。

“想生却不敢生”,说白了就是养不起,以前有不少媒体算过账,说是把一个孩子养大成人需要多

少钱,尽管不同媒体得出的数字并不相同,但负担沉重这个结论是一致的。现在,相当一部分“过来人”也表示了“不敢生”,再次验证了上述媒体的结论。由此可见,“全面放开二孩”这个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之举,很可能卡在家庭的自愿选择上。

事实上,这种“想生却不敢生”的状态,最近这两年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人口政策调整为“放开单独二孩”,但截至2015年5月仅有145万对夫妻提出再生育申请,而2014年的出生人口也仅比2013年增长了47万。此次在“放开单独二孩”仅仅两年之后,政策再扩大到“全面放开二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至少这两年之间生育情况并未达到人口政策调整的目的。

其实这也好理解,但凡有孩子

的人,都对目前养育子女的成本有切身体会。有多少家长,仅仅出于食品安全的需要,千方百计为孩子海淘代购奶粉;有多少家长,受困于老人帮不上忙,又无法放弃工作,因为选保姆、换保姆受尽折磨;又有多少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的学校,省吃俭用买了套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学区房……当然,前提还得是孩子身体健康,一旦摊上孩子生病,生了大病,整个家庭恐怕再无出头之日了。

虽然说政策上允许“全面二孩”了,但实际上对大多数人而言,二孩并非“可选项”。在养育、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一孩”享受的公共福利尚且不足,负担沉重的家长们哪还敢供养“二孩”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生育第二胎的产假只有三个月,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生育保障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的最少六个月纯母乳

喂养,“二孩”都是享受不到的。如此一来,考虑到“二孩”到来之后的“影响”,想生的最终决定不生,不失为一个家庭最理性的选择。

如此,家庭的选择与国家人口政策调整的初衷就有了差距,若放任自流,低生育水平维持下去,老龄化日益严重,直接结果必然是经济发展乏力,甚至由于人口结构呈倒金字塔状,造成社会性的老无所养。国家两年之内两次放开政策,足见调整人口结构的重要性,那么,如何让政策放开收到实效,就不仅仅是家庭的选择了。相比于单纯的政策放开,更需要一系列的保障举措,减轻家庭为养育子女所承受的负担。这一系列的保障举措,未必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激进地鼓励生育,非要让不想生的也生育,最起码得从人口结构调整的国家战略出发,要让想生的敢生才行。

公民论坛

叫板县纪委,镇委书记胆量何来

□李先梓

福建省平和县山格镇从镇党委书记、镇长到镇人大主席、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以及已调离该镇的镇原党政班子成员等17名党政干部均已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其中5人已被移送司法机关,违纪金额达1000万元。据报道,山格镇原党委书记曾石辉在今年1月份曾被拟提拔副县级,但被县纪委“拿下”,曾石辉竟公然打电话质问县纪委主要领导。(11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从报道的信息来看,曾石辉之所以有此惊人之举,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气急败坏。早在去年底,曾石辉就已经被拟提拔副县级职务了,对此志在必得。谁知竟在关键环节被县纪委给“卡”住了。二是有恃无恐。曾石辉为了获得提拔,提前做足了文章,有的退赃,有的销毁证据,他自以为能“水过无痕”,可以堂而皇之地叫板县纪委了。

除了上述两点,我觉得还有几处细节非常耐人寻味。

其一,从去年年底开始,曾石辉就被拟提拔副县级领导。但在这节骨眼上,县纪委收到了上级转来的对曾石辉的举报信,这才着手对曾石辉展开初核。曾石辉所在的山格

镇领导班子集体沦陷,形成了一个贪腐的圈子,曾石辉本人更是疯狂敛财。那么在此之前,究竟有没有人向县纪委举报过呢?如果有,为何不曾引起过县纪委的注意?

其二,曾石辉在向县纪委叫板的时候,曾经表示,我是县委常委、镇党委书记,这些年,平和县纪委从没调查过我这一级的领导干部……这句话尤其值得关注,是啊,这么多年了,县纪委从来没有调查过镇委书记这一级的领导干部,这难道不会给曾石辉带来某种“规律性认识”吗?山格镇17名领导班子成员集体沦陷局面的形成,是否与平和县纪委从未有“大动作”有关?

曾石辉做过山格镇的镇长、书记,而且有证据显示,他从干镇长时就开始贪腐,在他的“示范”下,山格镇的大小官员形成了竞相贪腐的局面,有的副镇长甚至伙同清洁工虚报工钱私分。如此乌烟瘴气,曾石辉却顺利升迁为镇委书记,足见县纪委也并没有完全尽到责任。正是这种“失之于宽”的反腐态度,让这名从基层走上来的干部目无法纪,自然也就不会把纪委放在眼里了,等到纪检监察部门动了真格,才会因为“不适应”做出“叫板”县纪委的出格之举。

“宠物扰邻”与“信用”怎能绑到一起

□苑广阔

一直以来,“宠物扰邻”是市民反映较为强烈、社会舆论较为关注的不文明行为之一。日前,上海市文明办、市公安局等联合召开“宠物不扰邻,生活共安宁”专项整治行动,考虑通过电子监控等平台对养宠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待条件成熟,“宠物扰邻”行为还将被纳入公共征信系统。(11月1日《新闻晨报》)

最近这几年,公共征信系统无疑是个热词,在社会失信现象屡见不鲜,诚信意识严重缺乏的当下,它的现实作用也值得期待。但我们也要知道,公共征信系统发源于西方国家,征信体系中“信用”这个词本身和银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核心是还款人的还款历史和记录,一般包括商业借款人和消费者借款人的诚信情况。

而随着数据库建设的逐步完善,公共征信系统开始把公民信用记录采集扩大到了支付电话、水、电、燃气等公用事业费用的信息,以及法院民事判决、欠税等公共信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信用状况。但即便如此,公共征信系统还是围绕着“信用”这个核心内容在开展工作,发挥作用。

现在问题来了,市民饲养宠物

所带来的扰民问题,与信用何干?这种行为,从道德上可以说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是宠物主人缺乏社会责任感;从法律上来看,涉嫌违反国家有关的法律规定。但是一定要把它和诚信有关,未免有些牵强。

“公共征信系统”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如果硬把一些本不属于公民征信范畴的问题也纳入这一系统,一方面会引起公众在认识上的混乱,搞不清楚到底哪些行为属于个人征信,哪些不属于个人征信,进而影响整个公共征信系统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把社会治理方面一些完全和个人征信无关的问题也纳入个人征信系统管理,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说有懒政之嫌,无非就是相关职能部门不愿意出头,不愿意“掺和”琐碎复杂的邻里纠纷,于是就期待用一个“公共征信系统”,额外加大“宠物扰邻”的成本,以此来约束市民自觉。

如果单看效果,这样做未必不好,不过,公共征信系统给市民带来的新约束,实际上相当于行政部门在法律之外对市民加以惩罚,本质上是法外施罚。这样的管理模式一旦铺展开来,行政权力也就很容易凌驾于法律,甚至以所谓的“公共征信”,剥夺了部分人的法定权利。这种后果是值得担忧的。

媒体视点

慈善立法,应重在“放养”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慈善法(草案),其中对“谁有资格发起公开募捐”作出规定:只有取得了民政部门许可的慈善组织,才有资格向社会发起募捐。非慈善组织的媒体、公益组织、个人发起募捐,拟被列为违法行为。

我国目前慈善事业的短板在于,国家层面的慈善组织心有余而力不足,民间慈善组织、个人风声水起,如何让国家层面的与民间组织相结合、相互补充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立法迫在眉睫。

慈善立法是好事,如何将好事做好,如何匡扶善心,功夫却在法外。不能为了彻底杜绝诈捐、诈募事件发生,就刻意将善心“圈养”了起来,设立高标准的慈善组织申请门槛,缩小慈善募捐的平

台和范围。如此一来,慈善募捐组织的纯净度得到了保障,但可能会导致很多爱心爱拒于门外,这有违民众期盼慈善立法的初衷。

良法善治,大爱无疆,慈善立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善心善举,让爱心真正能够传播到需要帮助的群体。慈善立法不能只是简单地立法而立法,国家层面应该结合当下中国的慈善特点,重在提供法律服务,既要充分考虑到爱心的特殊性,让真正从事慈善的组织、个人获得法律保障,又要让这些伪慈善得到应有惩罚。

所以,慈善法应该多从鼓励民间慈善力量、提供更广泛的平台、保障善款善举、降低慈善门槛的角度去考虑,少一些行政干扰、区域框定。(摘自《红网》,作者谢晓刚)

警惕城乡公共服务的“天壤之别”

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根据我们对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研究,如果村是1的话,那么乡是2,镇是3.8,县级市是10.7,城市是16.1。”这就是说城市人均的投入是村的16.1倍。

城市人口集中,空间紧凑,公共投入有规模化、集约化优势。在公共资源作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这种从效率上进行的考量,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反而使那些没有离开的农民得到的公共服务变得更为稀少,境况变得更差。更多农民的离开,使乡村变得更为萧条而荒芜,原本还有的一些乡村公共服务也就逐渐不存在

了。突出的例子就是乡村的学校。

城乡公共服务投入的巨大差距,主要是从经济效率角度考量而形成的,但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公共服务的投入,还必须从政治的角度,从公平、正义的角度予以考量。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权下的公民来说,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权利,是从国家得到平等对待的基本权利。如果人们从国家获得的公共服务的差距过大,则不但使身处乡村的弱势农民的权利得不到维护,而且也会引发人们对于国家和政权的疏离感,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摘自《中国经营报》,作者梁发芾)

一语中的

阿里巴巴一天净挣两亿,但是消费者没有觉得他挣多了,甚至双十一大家还会去捧场。

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表示,在用户体验时代,用户如果满意,你挣再多钱他们都会支持,公众之所以对“日赚4亿元”的三大运营商表示不满,主要原因还是看到其身处垄断地位,却并未给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务。

比如像大家诟病的零付团费操作模式,它本身像一条蛇,七寸就是强制交易和假冒伪劣,而相应的法律条款是不清晰的。

旅游专家刘思敏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应该用法律作为底线,有了旅游法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旅游法相关条款可操作性不

强。违法成本并不是太高,执法的成本却是非常大的,这就需要把法律进行进一步完善和修改。

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网络谣言,相关部门能不能及时披露事态真相,及时给公众一个非常清晰明了的权威性解答,凸现公权力的权威地位也尤为重要。

在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赵占领看来,网络实名制在防范谣言的同时,也给一些不法之徒创造了利用互联网违法犯罪的便利途径,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此,不能仅仅依靠实名制来清洁网络舆论环境。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